

陶渊明新说(下) 主持人: 范子焯

多声部的交响： 陶渊明《九日闲居并序》的互文性建构

北京 | 范子焯

在传世的陶诗经典中,《九日闲居并序》的名气并不是太大,与《归园田居》五首其一、《饮酒》二十首其五之类的名作相比,人们对这首诗的关注实在是太少了:

余闲居,爱重九之名。秋菊盈园,而持醪靡由,空服九华,寄怀于言。

世短意常多,斯人乐久生。日月依辰至,举俗爱其名。露凄暄风息,气澈天象明。往燕无遗影,来雁有余声。酒能祛百虑,菊解制颓龄。如何蓬庐士,空视时运倾。尘爵耻虚罍,寒华徒自荣。敛襟独闲谣,缅焉起深情。栖迟固多娱,淹留岂无成?^①

作品由序、诗两部分组成,结构清晰而整饬。诗序叙述了本诗的创作缘由,那就是诗人在重阳佳节之时,在秋菊盈园之际的无酒之憾,无论是有菊无酒,还是有酒无菊,都是令诗人遗憾的事,而回味这种遗憾则孕育着更加美好的诗意。这就像古代常见的表现“寻人不遇”的诗歌一样(如贾岛《寻隐者不遇》)，“不遇”反比“遇”有更多回味的余地。诗中“酒能”“菊解”二句,乃互文见义,实际是说饮用菊花酒的美好情事。《陶渊明集》卷三《饮酒》二十首其四:“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一觴虽独进,杯尽壶自倾。”首二句固然化用了屈原《离骚》“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的名句,但也表明了陶渊明确有饮用菊花酒的习惯。干宝《搜神记》卷二“贾佩兰”条说:“九月,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令人长命。菊花舒时,并采茎叶,杂黍米酿之,至来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饮焉,故谓之菊花酒。”陶渊明是养生家,所以喜饮菊花酒。一般认为,这首诗的创作背景与当时的江州刺史王弘有关。《宋书》卷九十三《陶潜传》:

义熙末,征著作佐郎,不就。江州刺史王弘欲识之,不能致也。潜尝往庐山,弘令潜故人庞通之贳酒具于半道栗里要之。潜有脚疾,使一门生二儿舆篮舆,既至,欣然便共饮酌,俄顷弘至,亦无忤也……尝九月九日无酒,出宅边菊丛中坐久,值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后归。

檀道鸾《续晋阳秋》^②和萧统《陶渊明传》^③也复述了陶潜九月九日无酒的雅事。《晋书·陶潜传》虽然没有记载此事,却用更多的篇幅叙述陶、王的交往,并突显了陶潜的平易性格和过人

气节。王弘字休元，出身琅邪临沂王氏家族，他的曾祖父就是东晋的王导丞相。他在义熙十四年（418），迁监江州豫州之西阳新蔡二郡诸军事、抚军将军和江州刺史，至元嘉四年（427）才离开江州之任^④，而陶渊明就在这一年的11月去世了。《陶渊明集》卷二《于王抚军座送客》诗提到的王抚军就是王弘。据《晋书》卷六十七《郗鉴传》，王导的从弟抚军将军王舒曾经参与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为平定苏峻（？—328）之乱而发起的军事行动，他们曾经共同战斗，建功立业。陶、王的十年交谊与这段家族史当不无关系。琅邪王氏是晋人过江以后的第一高门，所谓“王与马共天下”足以表明以王导为代表的这一阀阅世家的重要地位。而晋代旧族人物之由晋入宋者，又以王弘的地位为最高。他侍奉了宋武帝和宋文帝两代君王，最后位居三公，而在他出任江州刺史的时候，已然是集政权和军权于一身的社稷重臣了。《陶渊明集》卷二《岁暮和张常侍》诗所说的“市朝凄旧人”的“旧人”，就是指王弘这类出身于东晋名门而又服务于刘宋新朝的重要人物。这首诗的题旨本来是非常清晰的，但是，自南宋汤汉以来，由于某些人对“时运”一词的误解，导致了对这首诗的严重误读，如明宋濂《文宪集》卷十三《题渊明小像卷后》说：

有谓渊明耻事二姓，在晋所作，皆题年号，入宋之诗，惟书甲子，则惑于传记之说，而其事有不得不辨者矣。今渊明之集具在，其诗题甲子者始于庚子，而迄于丙辰，凡十有七年，皆晋安帝时所作，初不闻题隆安、元兴、义熙之号。若《九日闲居》诗有“空视时运倾”之句，《拟古》第九章有“忽值山河改”之语，虽未敢定于何年，必宋受晋禅之后所作，不知何故反不书以甲子耶？

在宋濂看来，《九日闲居》诗的“时运”，是指国家命运，“时运倾”就是说晋朝国家命运的倾覆。（案，诗中“如何”二句，宋汤汉注：“‘空视时运倾’，亦指易代之事。淹留无成，骚人语也。今反之，谓不得于彼，则得于此矣。后‘栖迟诘为拙’亦同。”^⑤）丁福保注曰：“言九日佳节，不可空过也，汤注谓指易代之事，失之。”^⑥丁氏的意见是正确的。《陶渊明集》卷一《时运》诗序：“时运，游暮春也。春服既成，景物斯和，偶景独游，欣慨交心。”诗曰：“迈迈时运，穆穆良朝。”古直注：“《庄子·知北游》：‘阴阳四时运行，

各得其序。’‘时运’二字盖本此。”^⑦王叔珉又引魏繁钦《杂诗》“时运有盛衰”和晋孙楚《除妇服诗》“时运不停”^⑧两句诗，足以坐实其说。关于前人对此诗的无端拔高，我们很容易破除，真正有意义的争论反映在清温汝能《陶诗汇评》卷二：

起五字包融无限，已领起通篇大意。沈确士谓：比古诗“人生不满百”二句，炼得更简、更道。予谓陶诗不事雕饰，何曾着意研炼，而自尔渊雅含融，此陶之所不可及也。末言时运虽倾而游息多娱，与下“栖迟诘为拙”同意。于闲散无聊之况而反得此逸兴，一结寄托遥深，尤为高绝。^⑨

沈德潜（字确士）的意见来自宋僧思悦：“古诗云‘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而陶渊明以五字尽之，曰‘世短意常多’。东坡云‘意长日月促’，则倒转陶句尔。”^⑩他认为这首诗妙在“炼”，巧于构思，精于锤炼，而温氏则认为这首诗妙在“不炼”，即不事雕琢、不饰研炼，自然而然就达到了“渊雅含融”的诗学境界。清朱庭珍说：“陶诗独绝千古，在自然二字。盖自然者，自然而然，本不期然而适然得之，非有心求其必然也。此中妙谛，实非功夫。”^⑪朱氏的意见正与温氏相类，这种意见在陶诗批评中处于绝对的强势。究竟孰是孰非？我们且看古直对这首诗的笺注^⑫：

	原文	笺注
①	余闲居	《孝经》曰：“仲尼闲居，曾子侍坐。”《礼记》有“孔子闲居”篇。闲居二字本此。
②	空服九华	九华者，九日之黄华也。《离骚》：“夕餐秋菊之落英。”服，犹餐也。有华无酒，故云空服。
③	世短意常多，斯人乐久生	汤注：“《幽通赋》：道修长而世短。”李注：“古诗云：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而渊明以五字尽之，曰：世短意常多。东坡曰：意长日月促。则倒转陶句耳。”直案：《列子·杨朱篇》：“理无久生。况久生之苦。”
④	日月依辰至，举俗爱其名	《艺术类聚》四引魏文帝《九日与钟繇书》曰：“岁往月来，忽复九月九日。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
⑤	往燕无遗影，来雁有余声	《月令》：“季秋之月，鸿雁来宾。”
⑥	酒能祛百虑，菊解制颓龄	《太平御览》五十四引《风俗通义》曰：“南阳酃县有甘谷，水甘美。云其山上大有菊华，仰饮此水，上寿百二三十，中者百余岁，七八十者名之为天。菊华轻身益气，令人坚强故也。”又魏文帝《九日与钟繇书》：“至于芳菊纷然独荣，辅体延年，莫斯之贵。谨奉一束，以助彭祖之术。”

- | | | |
|---|-----------------|------------------------------|
| 7 | 尘爵耻虚罍，
寒华徒自荣 | 《小雅》：“瓶之罄矣，维罍之耻。” |
| 8 | 敛襟独闲谣，
缅焉起深情 | 《国语·楚语》：“缅然引领南望。”韦注：“缅，犹邈也。” |
| 9 | 栖迟固多娱，
淹留岂无成 | 《楚辞·九辩》：“蹇淹留而无成。” |

在这里，古直两次引用了魏文帝的《九日与锺繇书》^⑩，我们再将《九日闲居》诗与这封信的若干语句加以对比：

- | | | |
|----|----------------------------------|-----------------------|
| 10 | 秋菊盈园，
而持醪靡由，
空服九华，
寄怀于言 | 故屈平悲冉冉之将老，
思餐秋菊之落英 |
| 11 | 九日闲居 | 岁往月来，忽复九月九日 |
| 12 | 斯人乐久生 | 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 |
| 13 | 露凄喧风息，
气澈天象明 | 含乾坤之纯和，
体芬芳之淑气 |
| 14 | 寒华徒自荣 | 至于芳菊，
纷然独荣 |

上举例4、例6以及例10—14足以表明《九日闲居》诗是对《九日与锺繇书》的重写，而另外七例也是这一诗歌文本的机体内隐藏的“异物”。这种情况用传统的渊源考证方法已经不足以说明问题了，因为就一首诗而言，如果其全篇几乎都胎袭前人之作，那么，这就涉及了这一诗歌文本的生成机制问题，或者说由这首诗所显现的诗人总体的创作机制问题。这就是互文性写作。

互文性是法国学者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在当代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中首先提出的一个概念，她认为任何一个单独的文本都不是自足的，任何文本都是一种互文，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与转化，它的意义在与其他文本交互参照、交互指涉的过程中产生，相关的经典性的表述是：“任何文本的构成都仿佛是一些引文的拼接，任何文本都是对另一个文本的吸收和转换。互文性概念占据了互主体性概念的位置。诗性语言占据了互主体性概念的位置。诗性语言至少是作为双重语言被阅读的。”^⑭这种被吸收和转化的文本称为“底文”或者“互文本”^⑮，也就是热奈特《隐迹稿本》所说的“一篇文本在另一篇文本中切实地出现”^⑯。《九日闲居》诗的整篇文本几乎都

来自其他文本，如果没有对《庄子》《礼记》《列子》《国语》《孝经》《诗经》《楚辞》和《古诗》等文本的深度吸纳，如果没有对《九日与锺繇书》的全面转化，这篇圆融典雅的诗歌文本就不能形成，而离开这些嵌入作品内部的底文，我们也就不可能真正了解和理解这首陶诗。乌里奇·布洛赫说：“既然一部作品是互文的组合，那么读者就要在文本中读入或者读出自己的意义，即从众声喧哗中选择一些声音而抛弃另一些声音，同时加入自己的声音。”^⑰确实，我们从这首静穆的诗中读出了“众声喧哗”的情调：在陶渊明那流连于栖迟之境的深情绵邈的主旋律的吟唱之下，还跃动着众多文化之声的交响。所以，我们可以把这首短诗视为一篇“多声部”的诗歌文本，犹如一首多声部的交响曲在我们的耳边激荡。诗中的底文是彼此交织、相互渗透的，并不存在明显的分界。这些底文主要来自儒家和道家经典。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陶渊明在吸收道家养生思想的同时，也接受了儒家思想的影响，儒道双修，外儒内道，正是陶公的本来面目。如果陶公的这首诗浓如醇酒的话，那么，苏轼的拟作则淡如清水了，我们读《东坡全集》卷三十一《和陶九日闲居》诗：

明日重九，雨甚，展转不能寐，起坐索酒，和渊明一篇。醉熟昏然，殆不能佳也。

九日独何日，欣然惬平生。四时靡不佳，乐此古所名。龙山忆孟子，栗里怀渊明。鲜鲜霜菊艳，溜溜糟床声。闲居知令节，乐事满余龄。登高望云海，醉觉三山倾。长歌振履商，起舞带索荣。坎軻识天意，淹留见人情。但愿饱糗糒，年年乐秋成。

开篇第一句已是没话凑话，拙劣之极，其境界与陶公原作相去何止千万里！可以肯定，苏轼的拟陶诗全部都是失败的。其实陶渊明既是模拟的圣手，又是反模拟的专家，陶诗是根本不可模拟的，给陶渊明充当文学侍从没有任何意义。以上我们对陶渊明《九日闲居》诗的互文性解读足以表明这一点。

互文性的学术视境，使我们窥见了一个极为复杂的陶渊明的文学世界。文学的记忆诚然是厚重的，而且注定要浸润每个创作主体的记忆，但它的层层累积永远为新的作品作着铺垫。在人类文学史上，任何一位作家的心中都不可避免地晃动着另外一些经典作家的身影。在文学的汤汤河流中，前波与后波总是相

续不断的。没有人能够隔断或割断与既有的文学传统的联系。因此，每位作家在影响的焦虑中，都要或多或少地、有意无意地追步前人的踪迹。对创作主体而言，影响的焦虑也是一种动力，它压扁了文学领域的小才，却激发出了创造文学正典的大才。哈罗德·布鲁姆说：“伟大的作品总不外是重写或重新检视的行为，它以解读为基础，此一解读为自我辟出空间，或是将旧作重新开启以承接我们新的苦楚。”^⑧优秀的作家首先是优秀的读者。没有陶渊明对《九日与锺繇书》等作品的解读，就没有诗人自我的艺术空间，也就没有这首超世迈俗的《九日闲居》诗：理智的清晰，情感的活跃，思想的自由，举止的庄重，趣味的高雅，道德的完善，自然的和谐，气度的雍容，构成了光明澄澈、怡人心目的美学境界。陶渊明对前人文化成果的认真学习、充分继承和深度转化及其为此所付出的辛勤劳作是不容遮蔽的。真正的文学研究者必当理解这位伟大作家的苦楚与辛劳。陶渊明是集诗人、学者、历史家和哲学家于一身的文化巨人。他的经典作品都是千锤百炼、百炼千锤的艺术结晶。伟大艺术家的惨淡经营与伟大诗人的旷世奇才，使其创造了不朽的辉煌。而只有深入探索陶渊明的互文性创作机制，才能真正展现其文学经典的原旨，才能真正认识其在人类文学史乃至文化史上的重要意义。“一首诗的意义只能是另一首诗。”^⑨“批评是摸清一首诗通达另一首诗的隐蔽道路的艺术。”^⑩让我们在互文性的文学批评之路上继续前行。📖

① 本文引用陶渊明作品，依据国家图书馆所藏宋刻递修本《陶渊明集》，《中华再造善本》丛书·集部，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3 年影印。

② 《太平御览》卷 996 引。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3—1986 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本文引用古籍之不注明版本者，皆为此本。

③ 俞绍初：《昭明太子集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91 页。

④ 《宋书》卷四十二《王弘传》。

⑤ 宋汤汉注：《陶靖节先生诗》卷二，《中华再造善本》丛书·集部，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3 年影印，“栖迟诘为拙”一句见《陶渊明集》卷三《癸卯岁十二月中与从弟敬远》诗。

⑥ 丁福保：《陶渊明诗笺注》卷二，台湾艺文印书

馆 1960 年版，第 47 页。

⑦⑧ 古直：《陶靖节诗笺定本》卷之二，台湾广文书局 1964 年版，第 35—36 页，第 35—36 页。

⑨ 王叔珉：《陶渊明诗笺证稿》，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10—11 页。

⑩⑪ 转引自高建新：《〈陶诗汇评〉笺释》，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65 页，第 65 页。

⑫ 转引自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史教研室编：《陶渊明资料汇编》（上册），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255 页。

⑬ 严可均：《全三国文》卷七，《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 4 册，中华书局 1958 年版，第 1088 页。

⑭〔法〕克里斯蒂娃：《巴赫金：词语、对话和小说》，转引自秦海鹰：《互文性理论的缘起与流变》，《外国文学评论》2004 年第 3 期。

⑮〔法〕蒂费纳·萨莫瓦约：《互文性研究》，邵炜译，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85 页、第 30—31 页。

⑯ 转引自〔法〕蒂费纳·萨莫瓦约：《互文性研究》，邵炜译，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9 页。

⑰ 转引自陈永国：《互文性》，《外国文学研究》2003 年第 1 期。

⑱〔美〕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江宁康译，译林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30 页。

⑲⑳〔美〕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焦虑》，徐文博译，三联书店 1989 年版，第 101 页，第 102 页。

本文属于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基金资助项目成果，项目名称：陶渊明文献精粹汇刊与研究，项目批准号：12JJD750004；本文属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学术创新项目“中国文学：经典建构与多元进程”成果；本文属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项目名称：陶渊明作品互文性研究，项目批准号：14BZW176

作者：范子辉，文学博士，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先唐文学研究方向首席

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教授，中国古典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领域为魏晋南北朝文学与文化。